

谢觉哉审计监督思想:形成、内涵及启示

谢冬慧

(南京审计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谢觉哉倡导勤俭节约、审查财政开支的审计监督思想,形成于他的家庭环境氛围、学校教育经历以及特殊的社会时代背景。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谢觉哉用行动诠释了该思想的基本内涵,特别是在经济条件艰苦的革命年代,谢觉哉主张严格审查财政并起草惩贪法规,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财政监督工作,与当时财政部共商经费对策,要求健全审计相关制度等。当下,谢觉哉的审计监督思想给了我们丰富的启示:加强公务活动的财务监督,开展勤俭节约的专项审计,严惩贪污浪费的犯罪行为,践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现代化强国而艰苦奋斗。

[关键词]谢觉哉;倡导节俭;监督财政;审计制度;惩治浪费;审计史;中央八项规定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5)06-0001-1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审计历史涌现了多位富有思想的审计领导人,谢觉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湖南宁乡人,生于清末,长于乱世,逝于当代。后人评价他是“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谢觉哉的确是个思想家,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主政权建设思想、家风建设思想、法律思想及统战工作理念等方面。然而,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熏陶的谢觉哉,既有商科教育的经历,也有艰苦军营生活的体验,还做过陕甘宁边区的审计委员会主席,他对审计监督有着独到的看法,且以亲身实践诠释了审计监督的思想内涵,主张严格审查财政并起草惩贪法规,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财政监督工作,与当时的财政部共商经费对策,要求健全审计相关制度等。今天看来,谢觉哉为我国的审计监督事业做过贡献,他的审计监督思想与当下的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较相一致,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但学界未见专门成果,故值得我们关注,本文试图做一点探讨。

一、形成背景: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合力

一个人某种思想的形成,往往与其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及社会背景等因素密切关联,谢觉哉审计监督思想的形成也不例外。谢觉哉倡导勤俭节约、监督财政开支的思想是有一定根源的,形成于他少小时代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及后来的社会背景。

(一) 家庭环境的熏陶

谢觉哉生于1884年,家里兄弟姊妹9人,他排行第五。然而,除了一个妹妹活到25岁、一个弟弟活到40岁,其他的兄弟姊妹皆夭折或早亡。因此,“在父亲的眼里,他始终是这个家庭未来的唯一希望”^[1]。谢觉哉备受父亲的关爱,也承载着家庭的重担。幼年时代的谢觉哉,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他出生在“一个自给自足颇有剩余的富裕家庭”^{[1]2}。这样的条件为谢觉哉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而且,谢觉哉小时候的家庭氛围也非常好。据记载,“谢觉哉的祖父谢瑞堂,性情纯厚,平生好善乐施,

[收稿日期]2025-05-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审计理论与实践研究”(21&ZD027)

[作者简介]谢冬慧(1967—),女,安徽池州人,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司法与审计文化,邮箱:230109@nau.edu.cn。

与人不争,乡里尊崇,族党敬仰,与儿辈们相处得十分亲昵,尤喜欢觉哉”^{[2]3}。祖父的个性和品格对谢觉哉的影响已被后来的史实所证明,谢觉哉勤劳节俭、同情关心,甚至解囊相助穷苦人,实际上传承了祖父“乐善好施”的美德。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就谢觉哉而言,他与祖父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在其成长过程中,受父母的影响更久更大。父亲谢恢前为人正直,生活俭朴。“他持躬俭啬而济人慷慨。家里长年以粗米瓜蔬为食,很少吃肉,认为肉不是平常人家能吃的。……然而对待别人则完全相反。”^{[2]3}也就是说,虽然家庭富足,但是谢恢前节俭持家,甚至到了吝啬的程度,对穷人却慷慨有加。并且,在节俭这个问题上,夫唱妇随。史料记载:“谢觉哉的母亲是一个良善妇人,会劳动,善家务,俭省节约,很受觉哉的尊敬。母亲从不溺爱他,从小就教他学会喂猪、割草,教他做善事、善人的道理。”^{[1]2}对父母的治家和为人理念,谢觉哉耳濡目染,深受其影响。就这样,在勤俭节省的家庭里长大的谢觉哉,幼小的心灵里就种下了“勤劳节俭”的种子。从此,勤劳付出、注重节俭的人生观念伴随谢觉哉一生,是谢觉哉早年审计监督思想形成的观念基础。

(二) 学校教育的影响

谢觉哉“从小资质聪颖,又异常勤奋”^{[1]3}。并且,他接受了较好的学校教育。一开始,家乡附近的学堂风气不好,谢觉哉的父亲就为他请来先生,在家里实行私塾教育。对谢觉哉的人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校教育有三段,每一个阶段对他的思想成长皆有帮助。

第一,小金陀馆教育。1902年,谢觉哉入读当地著名的私塾——小金陀馆,系统阅读了《资治通鉴》《海国图志》等。这些名著启发了他的心智,提升了他的思想,更开阔了他的眼界。如学者总结的那样:“谢觉哉在小金陀馆李藕苏先生的教导下,学习了三年,学业和思想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在这三年里,他受到当时最好的启蒙教育,结识了最相知的挚友,打下了中国文史哲经等思想文化的知识基础,接受了外来的思潮影响,已经是一个初步具有强烈爱国思想,怀抱拯救祖国危亡的态度,立志改革国家政治的封建知识分子。”^{[2]37-38}可见,小金陀馆教育对谢觉哉的成长意义深远。

在小金陀馆,谢觉哉不仅喜欢读书,还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其中,他重点关注有关“节俭”“清官”的历史,他“把《熙朝纪要》,分节俭、赈贷、徭役、行吏治(清官、贪官)守令等问题,分门别类,详尽摘出”^{[2]20},表明谢觉哉内心对节俭和清官的崇敬和向往。更难能可贵的是,“谢觉哉不满于中国社会的落后,在学习中思索着中国社会富强之路”^{[2]28}。在小金陀馆学习结束,谢觉哉于1905年考中秀才,极大地改变了自己及家庭的处境。可见,小金陀馆教育不仅为谢觉哉的知识积累和人生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也加深了他对节俭清廉的认识。与此同时,通过观察与思考,谢觉哉对社会经济有所体察和认识。无论家庭还是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础,尤其在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如何维护这个基础,需要依托一定的方式进行监督,以保持个人、组织及全社会的节俭和清廉。因此,小金陀馆教育奠定了谢觉哉审计监督思想的知识基础。

第二,跟随岳父学中医。谢觉哉于15岁结婚,其岳父是当地有名的中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原本,谢觉哉从小金陀馆毕业考中秀才,从事私塾教育。但不久,亲人的离世、教育的局限性,加上岳父的便利条件,让谢觉哉产生了从医的念头。于是,1908年,谢觉哉“弃教学医”,试图用医学拯救岌岌可危的清末局面。随岳父学医,虽然不是严格的学校教育,但是对谢觉哉的启发比较大。可惜两年之后的谢觉哉又改变了这一理想,他认为社会的疾病大于人体自身的疾病,医学难以拯救危局,这与孙中山当年放弃学医的想法颇为相似。从此,谢觉哉“放弃行医的打算,决计到现实社会生活去寻求医治社会病的良方”^{[2]58}。1911年春天,谢觉哉再次回到学校教书,担任国文兼历史教员。此时的谢觉哉深感压力大,其中有源自家庭的责任、求学的艰辛、生活的不易等等,但是最重要的压力还是国家经济发展缺乏有效监督,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已成为谢觉哉内心深处的“课题”,他必须认真思考和探索。

第三,湖南商业讲习所学习。湖南商业讲习所是中国推倒封建制度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前夜所创办的专门教育机构,旨在顺应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商学救国培养人才。该讲习所成立不久,改名为湖南中等商业学校,也就是今天湖南大学商学院的前身,它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商学教育的发端。1911年4月,谢觉哉考入创建不久的湖南商业讲习所,毛泽东于1912年春也考入该讲习所,二人成了真正的校友。当时受“西学东渐”影响较大,该讲习所的大半课程采用英文教材授课,传授发达国家的商学知识和理念。在讲习所的学习,谢觉哉同样收获不小,增长了关于经济学、簿记、会计、外语及国际贸易等学科的知识。1913年7月,谢觉哉以优异的成绩从讲习所毕业,为后来从事审计工作、开展财政经济监督奠定了知识储备和专业技术基础。

(三) 社会背景的作用

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社会时代的大背景,“谢觉哉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经受着深重的灾难,列强入侵,瓜分豆剖,中国逐渐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2}。这一社会背景对谢觉哉也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谢觉哉本人在日记里也曾谈到:“我生的乡村是偏僻的,辛亥的前几年,听到革命排满字样,还很骇怪……以后对时局常愤慨,喜接受新思潮,又常常令人感到失望。”^{[3]454-455}无疑,谢觉哉对他所处社会环境是有很多想法的,表明当时的社会背景对谢觉哉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坚定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事业。前文已述,谢觉哉出生于富裕家庭,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启发了新思想。尤其湖南商业讲习所的学习,使谢觉哉的思想变化很大,他非常推崇孙中山,欣赏革命救国的主张。后来,谢觉哉做过绅士,当过教师,任过主编。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对社会有了深刻认识,对前途逐渐明晰。他于1924年加入国民党,但很快于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谢觉哉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事业。他自己认为“从出生到亡命,生活上是小康的,政治上又没受过打击,不是‘逼上梁山’,大革命时,我是秘密的共产党员,那时情势,干脆做个国民党左派,是可以且似乎是需要的,升官发财的路摆在前面,我没有走……革命是件天大的事,依靠大众,依靠参加革命的各个分子,分子努力多一分,革命力量就增一分”^{[3]455}。随着社会的发展,阅历的增长,谢觉哉的思想不断成熟,而坚定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事业,成就了他的完满人生,使他有参与国家审计监督事业。

其次,为革命事业寻求财力支持。谢觉哉成长于动荡不安的年代,经历了世间诸多不平之事,尤其帝国主义的入侵,深知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而取得革命成功必须有经费保障。1936年1月,谢觉哉为筹集抗日经费而呐喊:“‘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伟大的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需要经费很多,怎样筹法须提出来说一说。”^{[4]215}谢觉哉试图征集社会各界的建议,他指出:“一方面要大大开展节省运动,把节省的物资捐助公家,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不浪费一文,士兵要使每一粒子弹打死敌人,办公的一张纸一支笔,都要爱惜,工人加紧生产,以最经济的物力做出较多的东西。这在事实上增加了抗日经费。”^{[4]216}在谢觉哉看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抗日经费,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开展节约运动,杜绝浪费,这实为监督经济、服务抗战之举。

最后,关心普通民众的经济疾苦。谢觉哉淳朴善良,关心普通民众的疾苦。小时候,他家乡的一位村民因家穷不得已偷了一点东西而受到重罚,谢觉哉出手制止。后来谢觉哉做了《湖南通俗报》主编,深感经济监督的重要,又借助于媒体抨击社会经济分配不公现象。例如,“在天灾问题上,谢觉哉除谴责地方当局的扩充军备及粮商的囤积居奇,造成粮食人为的紧张情况之外,更多的报道了人民的痛苦及呼吁社会谋求救灾之法”^{[2]82}。而“谢觉哉对于社会的种种弊病,是早有认识的,特别是对家乡一地连年的自然灾害,以及‘兵灾、匪灾、团防灾、委员灾’所造成的‘百孔千疮,补救非易’的局面感触更深”^{[2]95}。他亲眼所见社会现实,萌发思想火花,呼吁国家加大经济监督力度。

简言之,家庭的影响、学校教育以及现实社会的活生生画面和时代变奏背景,启迪他做出人生诸多的选择,从“弃教从医”到“弃医从教”,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促使谢觉哉审计监督观念的形成和固化。而以节俭资源、杜绝浪费为宗旨的审计监督,始终是革命事业成功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谢觉哉为此呼吁和呐喊。

二、内涵实践:革命年代维护财政的举措

思想理论源自生活实践,反过来也指导行为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谢觉哉的审计监督思想形成之后,一直指导其工作实践,特别是在江西苏区和陕甘宁边区艰苦的经济条件下,谢觉哉主张严格审查财政并起草惩贪法规,高度重视边区的审计监督,且与财政部就经费问题共商对策,要求财政上启用审计相关措施,设法节约经费支援革命,切实践行他的审计监督思想。

(一) 严格审查财政并起草惩贪法规

首先,严格整理财政。谢觉哉早就开始关注财政经济监督,强调财政经济需要经常整理和审查,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问题。早在1921年1月,谢觉哉给朋友周渭舫写信就指出:“说到整理,就逃不脱财政学上的公例,旧欠俟报销出后再说新支,当成立一个预算,预算成立后,要绝对遵守,东补西挪,必益纷也。”^[5]显然,谢觉哉所认为的财政整理是按照规则开支,先预算,清旧账,开新支,确保资金的高效使用。实践证明,整理财政是监督经济的一种有效方式,而谢觉哉所认为的财政整理更接近审计工作的性质,对财政监督的作用更大。

其次,起草惩贪法规。谢觉哉于1933年4月进入江西苏区后,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后来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任职期间,谢觉哉参与主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地方各级政权的建设工作,“协助毛泽东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法令和条例办法”^[1]⁶⁶。在苏区,谢觉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再由毛泽东签署公布。该《训令》于1933年12月公布,规定极为严格,凡“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并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没之公款”^[6]。在今天看来,这种处罚是相当严重的,也表明谢觉哉对贪污分子是非常憎恨的,认为需要严厉惩治。同时,这种做法是在树立审计的威力,因为贪污分子往往是通过审计线索查出来的。

该《训令》出台的背景之一,就是1933年11月谢觉哉曾带队到瑞金苏区审查财政工作。当时,得知审查的当地财政部长蓝文勋设宴接风,遭到谢觉哉的当场拒绝。并且,谢觉哉发现当地领导的苗头不对,立即突击查账,延长审查期限,发现了重大问题。在瑞金县常委会上,谢觉哉提出严厉批评:“当前战争够残酷的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节省每一个铜板、每一斤口粮支援前线,想不到瑞金县竟有用群众血汗养肥的贪官污吏!”^[7]事后,谢觉哉向毛泽东建议立法建制,让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官员,防止贪腐现象的发生。于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谢觉哉起草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最后,于实践中感悟审计监督力量。谢觉哉通过自己的细致审查,不仅发现了问题,也纠正了不少错案。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总务科科长涉嫌贪污被关押起来,准备判刑之前,谢觉哉经过多方调查,亲自审问那位总务科长,帮他细致回忆,逐一计算,终于真相大白,总务科长得以无罪释放。此外,谢觉哉还将自己对审计监督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1941年9月,谢觉哉致信毛泽东,提出:“财政上统筹统支即统一的原则,充裕时要这样,困难时更要这样。”^[5]²⁹当时的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压迫,经济极为困难,对于有限的财政和物资采取统筹统支,便于调剂使用,可以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这应是最好的审计监督方式。因此,谢觉哉的建议非常有见地和实际价值。

(二) 重视陕甘宁边区的审计监督

审计监督是确保财政开支有效运行的重要方式。陕甘宁边区原本地广人稀,经济十分落后,财政极为拮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边区以后,经济负担大大加重,使得本来拮据的财政问题更加突出,“为了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和边区党政自上而下,全面动员,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开源节流措施”^[8]¹⁰⁷,其中包括开展审计监督,及时堵塞财经管理中的漏洞。现有研究表明:“对浪费问题的审计监督,一直是边区审计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它不仅明确载入各项审计法规,而且贯穿在日常工作

中。”^{[8]61}而这场审计监督的推动者就是谢觉哉,当时的边区审计委员会是边区最早的审计机关,由谢觉哉主政,他带领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开展了很多创造性的审计监督工作。

根据记载,“1937年1月中央机关迁到延安后,为监督财政方针的执行和反对贪污浪费,中共中央特此成立国家审计委员会,谢觉哉任该委员会主席”^[9]。该审计委员会直接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所以权威性很高,很好地发挥了作用。“应该说这是边区第一个审计机构。这个国家审计委员会,基本上是沿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所设的审计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但对于它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情况等,目前发现的史料很少,还有待进一步考证。”^{[8]19}当时“审计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持红军刻苦节约的优良传统,防止腐化浪费,增加建设支出,工作重点是审核各机关、部队的经费开支是否符合手续,使用是否得当”^[10]。可以说,作为审计委员会主席,谢觉哉高度重视边区的审计工作,推行审计监督思想落地生根,更好监督财政,节约财政资金,保障革命需要。

不过,1937年的谢觉哉身兼数职,在担任审计委员会主席的同时,兼任中央西北办事处司法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等职。1939年,谢觉哉又任计划委员会主席。无论在哪个职位,即使不做审计委员会主席,谢觉哉也依然号召边区党政军廉洁从政,工资报酬最低化。他主张“边区的工作人员,上至边区政府主席,下至乡政府乡长,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每月1.5元至5元)。边区政府严禁任何贪污,贪污500元以上的处死刑。这种廉洁作风,是我国政治史上光荣的创举”^{[4]352}。谢觉哉还指出:“‘党政军工作人员的报酬,不能超过一个熟练工人’,这是定律……我们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反对喜舒服、爱面子的办法。”^{[4]353}他甚至主张:“官场宴会,应废除。有必要,可改设茶点,因浪费而无益于人也。”^{[3]138}此时的谢觉哉已将节俭廉洁的经济思想与党政军人的工资津贴联系起来,予以量化考虑,包括贪污处死的量刑标准,为民众参与国家财政监督提供了硬性参考指标。

谢觉哉认为,实现节俭、杜绝贪污,需要通过加强监督的力量,提高干部的思想素养。正如学者所言:“谢老一贯主张干部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不然,你是治者,人民是被治者。”^{[1]141}1940年6月,谢觉哉在当时的《新中华报》“党内批评”栏目发表了一篇题为《防止贪污与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长文,提醒“经常做财政经济工作的人,与钱接近,多用了一点,在账上弥补,‘瞒上不瞒下’……有的挪移公家支放的钱放在合作社里,致应早发放的迟发放……引起了党内阶级成份的变化”^{[4]368}。而“贪污,不仅党不容许,法律也必予制裁。……贪污和资本主义思想,是与共产党员资格不能并存的,相信,只要我党一注意,必能在极短时期纠正过来”^{[4]371-372}。谢觉哉的系列论述,旨在教育干部尤其是经济战线上的干部,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做清正廉洁的典范。1941年,谢觉哉在边区县长联席会上指出:“个别干部的确落后于群众,落后的原因由于没有建立民众监督政府的机关所致”^{[11]73}。而“边区是边区人民的,边区政治要边区人民来议、来管,只有边区人民真正来议、来管,才能发挥出无限力量。”^{[11]73}可见,谢觉哉号召民众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监督边区的干部杜绝经济问题,提高思想素养,做好边区工作,发展边区经济。

在谢觉哉看来,“人民可随时监督或贡献意见于政府,政府不会拒绝,因为这于他有益的”^{[4]352}。1942年4月,谢觉哉担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仍不断呼吁各地克服财政困难,在《关于选举、公债、法币等问题给绥德专员的复信》中,谢觉哉认为:“这些过渡期中的困难,我们都必须以政治的人为力量来克服它。”^[12]所谓“以政治的人为力量来克服它”,其实就是从当时的革命大局出发,为保障前线物资需求,严格节约其他开支,启用审计监督的办法,使人们真正执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形成助力前线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 与财政部就经费问题共商对策

1937年2月17日,针对边区严峻的财政经费问题,作为审计委员会主席的谢觉哉与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共同商讨对策,联名发出了关于经费问题的《通知》,决定自3月份起,对各机关经费支付及其标准予以变更,并要求:“各机关接到这一通知后,应立即根据上列标准,按照缩编后的人数,编制3月

份预算,至迟于二月二十三日连同花名册送到审计委员会。”^{[13]76}执行的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大,具体规定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切经费全部改发通用法币”^{[13]75}。由于法币是从1935年11月4日至1948年8月19日期间流通的法定货币,其管理严格,信用度很高,发行量有限,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法币发行量不超过14亿元。因此,陕甘宁边区选择法币作为一切经费发放的依据,杜绝滥发货币。这一规定,比较契合当时的社会形势,便于管理和监督,也易于审计。

第二,对伙食费、烤火费、鞋袜费、马草费、津贴费、路费等七种经费的标准做了明确规定,如伙食费(粮食费除外)、“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天二分五厘,后方部队每人每天三分,各独立军部队每人每天四分,工厂工人每人每天四分,医院每人每天五分,红大学员每人每天五分,党校及其它学校每人每天四分,临时训练班三分”^{[13]75}。鞋袜费,“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三角,武装部队每人每月四角(地方武装另定)”^{[13]76}。费用发放标准因人而异,但部队及一线岗位明显高于机关,既体现战时财政方针,又利于审计监督工作。

第三,对办公费、购置费、修理费、特别费等四种经费的核发条件做了详细要求。例如,购置费的核发,应详细开列应购某种物品及用途,并如何估价,否则不予核发;对于修理费的核发,“应说明修理什么?为什么修理?如何估价”^{[13]76}。要求如此详细的说明及价格评估,为边区经费的审计监督提供依据,确保各项经费使用的效率和意义,反映了处在财政困难时期的边区政府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经济举措,也是谢觉哉审计监督思想的具体体现。

第四,规定了审计委员会核准经费的严格程序。如对于特别费“应事先得中财部及审委同意方可开支,并应另编追加预算,否则概不承认……如事前未得审委核准,擅自缝制服装毛毯者,该项支付概不承认……凡未经过追加预算,或事前未得审委同意……亦不承认此开支”^{[13]76}。这些规定表明,陕甘宁边区的每一笔开支都执行严格程序,要经过国家审计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和批准,这就为特殊时期节约经费、保障军队供给提供了空间。审计是财政监督最有力的手段,由此,谢觉哉的审计监督思想在边区财政工作实践中再次得到体现。

(四) 财政上健全审计相关制度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局,需要发挥制度优势,也就是从制度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这样方可持久有力。于是,继“关于经费问题”的《通知》之后,1937年4月23日出台的《苏维埃政府关于财政措施的新规定》聚焦了健全审计相关制度问题,实为有关审计的法规文件。这里,实际上吸纳了国家审计委员会谢觉哉等人的思想和建议。

第一,健全制度的原则和宗旨。依据该新规定,苏维埃政府号召边区军民养成节俭的好习惯,“原则上: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俭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13]76}。尽可能减少浪费,增加建设支出。此时暂处和平状态,健全制度和采取措施,继续紧缩开支,其目的很明显,就是确保有限的资金用于边区建设和备战备荒工作。

第二,启用预决算制度。根据该新规定,经费的开支必须事先进行预算,年终对预算执行情况开展盘点结算。战时状态下,开支一般零乱不堪,无法预决算。1937年4月,处在和平状态的边区政府便启用预决算制度,规定“预算上没有的,不许开支;某项费用业经规定限度的(如办公费、马乾费之类)不能超过,决算上的项目单据不能含混”^{[13]77}。预决算制度对经费使用的程序、限度及凭证均有严格要求,为审计奠定基础,应是管控经费、减少浪费的良好制度设计。

第三,健全审计机构。该新规定要求有审计机构的地方“要认真审核,不仅看他是否合手续,并要审他用得恰当”^{[13]77}。强调审核经费使用的程序合法、实体恰当。而“在没设审委的地方,财部、供给部,须负责审计”^{[13]77},表明当时审计机构是多元的,既有专门机构,也有兼职机构,体现对审计的重视。

第四,严格执行审计。1937年6月29日,谢觉哉在《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讲话中就边区财政支

出办法再次提到:“1. 减少消费的支出,增加建设的支出;2. 不采取旧社会上下悬绝的供给制;3. 财政统一尽可能节省,严格执行审计制度,我们以前是这样办的,以后还是这样办”^{[13]337}。只有严格执行审计,才能减少消费支出,真正达到审计监督的实效。

可以说,边区政府在特定时期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审计监督措施,并且做到严格执行,这是谢觉哉审计监督思想在实践中运行的一个侧面或缩影,其对维护边区经济,巩固边区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言之,谢觉哉的审计监督思想在边区政府的干部教育及财经管理实践中得到较好的贯彻和落实。通过审计委员会主席职务,谢觉哉在边区财政工作中推行审计制度,广泛开展审计监督,为边区财政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三、启示思考:当下加强审计监督的重点

谢觉哉的审计监督思想形成于特定的家庭、学校及社会背景,应用于火热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发展壮大,与谢觉哉等优秀领导人对财政经济的审计监督思想及其实践是分不开的。当时,审计监督的宗旨是弘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开展节省运动,杜绝贪污浪费,最终的目的是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如今,强化“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谢觉哉审计监督思想给了我们丰富启示:加强公务活动的财务监督,开展勤俭节约的专项审计,严惩贪污浪费的犯罪行为,乃是维护经济稳定,保持社会廉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力措施。

(一) 加强公务活动的财务监督

公务活动,是指基于公共事务而进行的职务活动。由于该活动的资金来自国家财政以及纳税人的公共资金,其使用流向及明细构成的财务状况有接受监督的义务和职责。因此,加强公务活动的财务监督,理应是审计监督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内涵。“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甘做人民的公仆。”^[14]他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他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作风,给我们后辈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谢觉哉关注公务活动的财务监督,致力党和国家的廉政事业,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

首先,严控公务开支。从苏区到边区,谢觉哉一向主张紧缩公务开支,节约一切资源,支援前线,确保革命胜利。他非常喜欢毛泽东的经典名言:“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15]134}他极力推行毛泽东的经济节约思想,当时的《红色中华》头版头条“社论”的标题“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16]155}或者“一切节省给予战争”^{[16]2911}等,主张严格控制公务活动的开支,广泛开展节俭运动,这些都取得了良好成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继续保持艰苦节俭的传统,严格管理公务开支。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2013年《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相继出台,旨在强化廉洁从政和节约资源,为公务活动的财务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现今,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公务活动的主体更多,内容更加广泛。然而,公务资金使用浪费现象仍然比较严重。2025年上半年,结合中央八项规定而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重新公布,对遏制公务浪费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中的公务活动,以及上述单位委派到非公立单位的人员所从事的公务活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约束,实践中有必要从财务报销等源头上管控公务开支。财务监督是控制公务开支的有效途径,只有加强而不能弱化,代理从事公务活动的私营企业要有社会责任,厉行节约,接受监督。

其次,执行预决算制度。也即公务开支必须事先预算,年终再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盘点结算,这是谢觉哉当年对公务经费开支的监督要求。他坚持折中“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原则,即“收入多少钱,才用多少钱;最好还能够余蓄一点;如钱不够,就不用,这叫做‘量入为出’主义。”而“要用多少钱,就弄多少钱;钱不够,或增税或借内债或外债,这叫做‘量出为入’”^{[4]481}。这里的“量”即含有“预计”之意,充分考虑已有家底和实际需要,做好公务活动的预算和决算工作,避免浪费发生。诚如学者所言:“当前,预决算越来越受公众关注,为了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我国不断加大预算信息公开力度,增强预算透

明度。”^[17]目前,我国财政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加上公务活动性质特殊,执行财务预决算制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最后,树立为“公”理念。缩小工资差距,节省国家支出。过去,针对边区严峻的财政经费问题,谢觉哉建议党政军工作人员实行最低工资制,要求公务人员的报酬不能超过一个熟练工人,且接受审计机构及人民群众的监督,在边区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他的主张为共产党赢得边区人民的尊重和拥护奠定了基础。尽管有敌人的围追堵截和疯狂围剿,但由于有边区民众的强大支持,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的革命任务。今天,经济条件有了明显改进,但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总体高于熟练工人,应该遵循按劳分配原则,树立为“公”理念,公务人员与工人的收入水平应保持相对平衡,缩小工资差距。并且,公务人员的工资支出及其财务状况也应公开,接受社会和民众的监督,提升人民对政府和公务人员的满意度。

(二) 开展勤俭节约的专项审计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陕甘宁边区长期处在敌军的包围和封锁之下,财政经济十分困窘,弘扬勤俭节约传统、开展节省运动非常必要。只有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保障,才能取得革命胜利。1934年上半年,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各省分会开展了一场节省运动的专项审计,以考察节省运动的成效。此时的谢觉哉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对专项审计起到了推动作用。1937年上半年,谢觉哉担任甘宁边区审计委员会主席,这恰恰是边区政府的知人善任的体现。随着边区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机关、部队人数增加,行政经费开支必然急剧增加,不仅如此,还要应付抗战任务,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个稳定可靠的财政。为此,设置专门的审计机构统一梳理边区财政、监督财政混乱的局面很有必要。而谢觉哉有丰富的审计监督工作经验,让他做边区审计委员会主席,非常合适,他将苏区节俭审计的理念带到了边区。今天,谢觉哉所倡导的边区勤俭节约的专项审计经验仍值得借鉴。

第一,符合审计工作的初衷。无论是苏区还是边区,审计委员会都有一个初衷,就是监督财政方针的执行,推进节约运动的开展,杜绝贪污浪费现象的发生,为革命提供更多的财政和经济支持。而谢觉哉作为苏区审计委员会的推动者和边区审计委员会的负责人,为当时的节约运动专项审计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审计监督思想在革命斗争中也得以实践。当年,深处财政窘迫拮据的革命根据地,财政政策和审计制度均围绕着节省资源供给前线的宗旨。其中,财政政策是总体布局,审计制度实际上是监督政策的落地落细。也就是通过开展勤俭节约的专项审计,监督有关经费合理使用,力争节约更多的经费用于支持前线部队作战,助力早日赢得革命胜利。今天,国家倡导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政府号召“过紧日子”,旨在节省开支,集中财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谢觉哉的节省专项审计表明,贯彻节约精神需要依赖审计监督的作用。因此,当年专项审计的经验至今仍可参考,充分发挥审计在节约活动中的作用。

第二,考察节约活动的效果。1934年的节省运动专项审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苏维埃政府被称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6]3912}。这一经验的取得,与谢觉哉的审计监督思想不无关系。1933年5月,谢觉哉在江西苏区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协助起草文书及条例法规等,其中就包括苏区节省审计的筹划工作。后来到边区后,谢觉哉继续支持这一做法。1937年1月,谢觉哉担任国家审计委员会主席,更有机会推广节俭运动及审计工作的经验。同年4月《苏维埃政府关于财政措施的新规定》出台,虽然未署名谢觉哉,但是少不了他的贡献。该新规定“要求逐渐减少浪费的支出,增加建设支出。要求健全预决算和审计等各项制度。……要认真审核,不仅查看是否符合手续,并要审查使用是否得当”^[18]。可见,当时政府审计职权十分清晰,目的明确,就是保持节约,防止浪费。如今,中央八项规定无不体现节俭精神,有必要引进审计监督机制,通过审计考察其实效。

第三,促进勤俭节约的推行。身处战乱和经济困难时期的谢觉哉极力倡导勤俭节约,并通过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立法建制予以推行。谢觉哉曾致信毛泽东:“要想尽办法厉行节约,力争做到钱要用得少,

生活要比以前好,人要用得少,工作效率比以前高。”^{[1]154}实践证明,毛泽东制定边区经济政策时参考了谢觉哉的建议,从而推动了革命时期勤俭节约的开展,尤其是节俭审计的监督,既确保了节俭活动的实际效果,又有力地促进了勤俭节约的推行,“事实充分说明,谢老对边区经济的好转,军费开支的保证,以及边区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154}。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均非常深远。一段时间大小餐馆采取措施推行粮食节俭,民众也有所注意,但没过多久,粮食浪费依旧,其他浪费“死灰复燃”。本文认为,在物质极大丰富但世界变局加速的今天,勤俭节约仅仅靠“倡导”是不够的,有必要借鉴谢觉哉审计监督的思想理念,采取必要的措施,开展节俭活动的专项审计,促进勤俭节约的有效推行,确保节约活动的常态化、制度化。

(三) 严惩贪污浪费的行为

谢觉哉主张审计监督需要依法治理贪污浪费的行为。他是当时少有的精通法律的人才,法律意识很强,主张拿起法律武器对抗社会上的不平之事。“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谢觉哉一贯坚决反对。”^[14]尤其贪污浪费,最令谢觉哉不能容忍。革命年代,“他指出边区各级政府因久未改造,不少地方已发生强迫命令、贪污腐化的现象,人民敢怒不敢言”^{[1]141}。还有“报载各县,赈款多未及民,有在官绅手中者,保长与查账员不免徇私……”^{[3]140}对于社会上出现的贪污腐败,谢觉哉极为痛心,积极建言中央政府制定法律,实行依法治理。

我们知道,贪污浪费是勤俭节约的反面。毛泽东在1934年1月的苏共二大会议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5]135}对此,早在1933年4月,始任毛泽东秘书的谢觉哉就在广泛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建议并协助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制定的第一部完整针对反贪污浪费的法律文献,标志着反贪污浪费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19]。当时的《红色中华》报连续发文主张“坚决打击各式各样的贪污分子”^{[16]2699}及“开展反贪污浪费的全线进攻”^{[16]2700}等,旨在告诫苏区政府和人民,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必须制度化和严厉化。这些文章实际上表达了谢觉哉的观点,如他指出:“节约的方针不是减少必要的消费,而是在于节省根本不需要的浪费和可以不需的开支,……我们之所以要提倡节约,因为我们的确还存在不必要的浪费现象。”^[20]除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谢觉哉于1938年起草的《整顿甘肃下级政治机构的意见》,第一条意见就是“惩贪污”^{[4]298},由此可见一斑。作为财政经济监督的重要手段,审计的宗旨和本质重点关注的是贪污浪费问题,而陕甘宁边区审计委员会的宗旨即是监督财政方针的执行和反对贪污浪费。

新中国成立之后,谢觉哉一直坚持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并教育子女杜绝贪污浪费。1950年12月,谢觉哉写信给儿子谢放,谈到反贪问题:“你们已学习党中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文件否?……你们那样的机关,贪污与浪费事件必然有且不少。你应该学习与掌握运动以锻炼自己。”^[21]谢觉哉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为后人做了表率。近些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耗费大量财力物力,我国的经济压力更大,但是贪污浪费行为却大量存在,如何治理?谢觉哉严厉打击贪污浪费的观点,值得借鉴。

综上所述,谢觉哉倡导勤俭节约,监督财政开支的审计监督思想,形成于他特定的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在谢觉哉的审计监督思想指导下,边区的审计监督围绕当时战争形势、巩固革命政权的特定历史条件而展开。审计是反腐的利器,这是对审计功能的最好诠释,也是谢觉哉倡导节俭、反对浪费等审计监督思想的内涵,它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相一致。今天,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重温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审计监督思想,意义非凡,因此,要加强公务活动的财务监督,开展勤俭节约的专项审计,严惩贪污浪费,实施全面节约战略,真正走向节约型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

参考文献:

[1] 谢觉哉. 谢觉哉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 马连儒. 谢觉哉评传[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 [3] 谢觉哉. 谢觉哉日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4] 谢觉哉. 谢觉哉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5] 谢觉哉. 谢觉哉书信选[M]. 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
- [6] 张希坡. 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第二辑上下卷[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997.
- [7] 何立波. 人民司法制度的开拓者谢觉哉[J]. 检察风云,2010(13):80-82.
- [8] 中国审计学会,陕西省审计研究所. 陕甘宁边区的审计工作[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 [9] 党波涛. 中华民族脊梁故事:现代卷[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76.
- [10] 李金华. 中国审计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276.
- [11]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C].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 [12]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C].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309.
- [13] 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 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C].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
- [14] 王兵. 谢觉哉家书中的家教与家风[J]. 党史博览,2017(4):24-27.
-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
- [16]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 红色中华:全编[C].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17] 曾金华. 预决算“明白账”意在强化社会监督[N]. 经济日报,2021-07-10(5).
- [18] 审计署.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审计工作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84.
- [19] 缪平均. 中央苏区第一部“反贪污浪费”法律文献的形成[J]. 炎黄春秋,2020(12):21-24.
- [20]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八编[C].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43.
- [21] 谢飞. 谢觉哉家书[M]. 上海:三联书店,2015:70.

[责任编辑:苗竹青]

Xie Juezhai's Thought on Audit Supervision: Formation, Essence, and Implications

XIE Donghui

(School of Law,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Xie Juezhai's ideas of auditing supervision, which advocated frugality and thrift as well as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s, were shaped by his family environm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 unique social context of his time. In his subsequent work practice, Xie Juezhai demonstrated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hese ideas through his action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challenging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revolutionary era, he advocated for strict financial reviews and drafted regulations to punish corruption. He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fiscal supervision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s, collaborated wit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o devise strategies for fund management, and call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auditing systems. Today, Xie Juezhai's ideas on auditing and supervision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upervision over public activities, conducting specialized audits on frugality, severely punishing crimes of embezzlement and waste,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s eight-point decision, and working diligently to build a conservation-minded societ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a modernized, powerful nation.

Key Words: Xie Juezhai; advocating for frugality; overseeing public finance; audit system; punishing waste; audit history; Central committee's eight-point decision